

青年人才发展

DOI:10.15998/j.cnki.issn2097-6763.2026.03.010

我为什么不想读了:研究生退学意愿的生成类型与阶段特征



王梅,蒙俊辉,时玉坤
(天津大学 教育学院,天津 300354)

摘要:研究生退学意愿这一隐匿议题正通过数字空间广泛浮现于公众视野。基于微博“研究生退学”超话社区中212篇长帖文本,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对研究生退学意愿的生成类型与阶段特征进行考察。研究发现,研究生退学意愿的生成并非线性因果,而是多重困境并发的组合效应,具体呈现为三大类7种类型:单一困境驱动下的教育失能型、心理崩解型与外部挤压型,双重困境叠加下的教育失能与心理崩解交互型、心理崩解与外部挤压交互型以及教育失能与外部挤压交互型,三重困境联动下的教育失能、心理崩解与外部挤压复合型。研究生退学意愿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呈现较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通常历经现实冲突、决策困境与行动矛盾3个阶段的反复拉扯。理解与干预研究生退学意愿的“临界状态”,需从结构、支持与文化3个维度协同推进;通过优化教育制度结构以预防退学意愿早期滋生,构建全程支持网络以纾解退学意愿的阶段发展,通过消解污名文化叙事拓展退学意愿的容错空间,从而促进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健康运行。

关键词:研究生;退学意愿;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临界状态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6763(2026)03009412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我不想读了”这一情绪表达,正通过微博、小红书等平台演变为引人关注的群体性话语,大量研究生以长文形式分享在读期间的内心挣扎与退学意愿。以小红书“#研究生退学”为例,截

修回日期:202510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发展格局下卓越工程师培育生态系统的演化与治理研究”(23BGL263);天津市教委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制造强市背景下天津市卓越工程师培育生态系统研究”(2023JWZD04)

作者简介:王梅,女,河北唐山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研究生教育研究;

蒙俊辉,男,河北承德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研究生教育研究。

通信作者:时玉坤,男,山东济南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研究生教育研究。

引用格式:王梅,蒙俊辉,时玉坤.我为什么不想读了:研究生退学意愿的生成类型与阶段特征[J].重庆高教研究,2026,14(3):94105.

Citation format: Wang Mei, Meng Junhui, Shi Yukun. Why I no longer wish to continue; the formation patterns and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graduate students' dropout intentions[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6, 14(3): 94105.

至2025年8月,其讨论量与浏览量高达179.5万次与2.6亿次。这一现象不仅将长期处于冰山之下的退学议题推至公众视野,也反映出研究生在学业、科研与未来发展上的普遍困境与深层焦虑。与欧美的高退学率不同^[1],我国研究生实际退学比例较低,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2019—2023年我国研究生退学总人数74 093人,退学率常年维持在0.5%左右^①。低退学行为的表象与网络空间中高退学意愿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事实上,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高昂教育投入、家庭期望及社会评价体系构筑了退学决策高门槛,使研究生退学意愿多呈现为长期存续的“想退而未退”的消耗性挣扎,对研究生学术投入、创新能力及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理解该群体退学意愿的生成类型与发展阶段,已成为关乎研究生个体成长、教育制度柔性回应以及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

学界对高等教育学生流失的探究,发轫并成熟于本科生教育领域,其中文森特·汀托(Vincent Tinto)的学生整合模型与约翰·比恩(John Bean)的学生流失模型最具代表性,他们分别从社会学与组织行为学的视角构建了系统分析框架。相比之下,针对研究生退学的研究相对零散,尚未形成系统理论模型与成熟分析范式。审视关于研究生退学的既有研究,国内外呈现不同的侧重与进展。国外研究偏向结果导向的归因逻辑:研究生退学率在不同地区与学段存在差异,并受宏观经济状况^[2]、导师指导有效性、院系支持性文化^[3]、个体人口学变量^[4]、工作学业家庭冲突^[5]、学术自我效能感以及结果预期与职业目标清晰度^[6]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研究也关注研究生退学行为及成因,早期研究发现出国深造以及找到称心工作会引发研究生主动退学^[7];“下海热潮”等社会环境因素^[8]与个体心理问题^[9],也被证实是研究生退学的重要原因。伴随研究生教育实践与研究的拓展,国内已有少量研究开始探究更为前置与潜在的研究生退学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标志着研究关注点已从结果导向延伸至过程关切。例如,已有研究探讨了读研动机、环境适应、导生关系、科研资源、认知与学术要求匹配等因素如何催生退学意愿^[10-11];部分研究还从教育治理角度关注研究生分流与退出机制的制度设计与规范运作^[12]。

整体而言,既有研究在解释“我不想读了”这一普遍困境时,仍存亟待深化的空间。一是多数研究将研究生退学视为终点事件或结果变量,忽视了研究生退学意愿本身作为一个充满矛盾的“临界状态”所具有的独特价值,遮蔽了“虽未实际退学、却在读与不读”之间反复拉扯的庞大群体,从而无法捕捉有退学意愿研究生群体的真实困境,使得学界对研究生整体生存状态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二是无论量化归因还是质性访谈,现有研究仍停留在对特定时间切片的静态分析,难以揭示研究生退学意愿的内在生成逻辑。事实上,研究生退学意愿的生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影响因素往往相互交织,并在持续拉扯与心理挣扎中逐步显现,同时受社会性话语建构的动态影响,但现有框架难以全面解释研究生在独特学术生态中的复杂决策过程。基于此,本研究聚焦研究生退学意愿的生成逻辑,即研究生退学意愿如何生成,其发展阶段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为回应这些问题,研究选取微博“研究生退学”超话中的长文叙事作为质性材料,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从个体叙述与集体讲述中提炼退学意愿的生成类型与发展阶段,旨在超越将“退学”视作失败或污名的单一理解,为处于临界状态的研究生群体提供制度理解与情感转圜空间,以期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提升与政策优化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资料来源于微博“研究生退学”超话。该社群围绕“研究生退学”议题持续互动,形

^① 此数据根据2019—2023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计算公式为:学年退学率=(学年内退学学生总数/学年开学初在校学生总数)×100%。

成了具有独特规范、话语体系与情感文化的线上表达空间^[13],具有相对匿名性与包容性的特征,有利于用户进行深度自我暴露与经验叙述^[14]。相较于其他研究情境(如访谈),此类“野生叙事”往往更具真实性与自然性,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研究者在场可能带来的期许性偏差。自2018年建立以来,该超话社区关注者超过107万人次,大量用户的自发叙事构成反映群体经验与心理状态的数据库。

为确保资料叙事深度与结构完整性,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策略,通过网络爬虫抓取该超话2020年1月至2024年12月的所有原始帖文,并以“帖文字数不少于500字”作为纳入标准。长帖文本更易展现发帖者对个人经历的系统梳理、内心矛盾的反复思量及未来抉择的博弈,为解析退学意愿的生成提供了必要的“深描”基础。经初步筛选,共获得帖文356篇;经过多轮人工甄别与校验,剔除广告、偏题及纯转载内容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212篇,总计15.2万余字。

(二)研究方法

研究生退学意愿并非静态的可量化变量,而是在特定情境中动态生成、富含个体意义和情感波动的复杂社会心理现象。为探究研究生退学意愿的生成类型与发展阶段,需采用能够充分捕捉主观经验完整性与过程性的研究方法。为此,研究以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为核心方法。区别于客观主义扎根理论对理论“客观存在”的预设,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主张研究者与参与者共同建构意义^[15],强调理论源于研究者与数据的互动对话,契合本研究剖析个体借由网络叙事重构困境的目标,有助于敏锐捕捉研究生退学意愿在数字公共空间中生成复杂、流动的社会性意涵。

(三)分析过程

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对收集的212篇网络长帖进行系统分析,包括初始编码、聚焦编码和理论编码3个阶段,并在编码完成后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其中190篇用于编码,22篇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为保障发帖者隐私与研究伦理,编码前对原始微博内容进行脱敏处理,删除所有用户名、位置、@对象等可能识别身份的元素。同时,对涉及导师、院系等具体名称的内容进行模糊化处理(如“某工科院校”“某985高校”),避免暴露具体个体。为便于分析与引用,所有长帖统一编号为A001至A212。

1. 初始编码

初始编码是研究者与原始资料进行系统接触与分析的起始阶段,旨在通过逐行或逐段阅读文本,识别其中所蕴含的行动、情绪与意义,并以简短、概括性语言对其进行命名。该过程强调紧贴数据本身,避免过早抽象化或理论化,同时注重研究者在理解与诠释过程中的主体性与反思性^[16]。遵循这一准则,本研究最终获得1656个初始编码(见表1)。

表1 初始编码示例

初始编码	微博长帖摘录(A032)
入学期待产生落差	这才研究生半年,想当初兴致勃勃地接到录取通知书,现在生无可恋
被动接受研究任务	大概过了两个星期就确定了方向,是要接手一个即将毕业学生的课题,当时就稀里糊涂地同意了
导师的指导缺失	一个学期就见过导师一次面,还是在新生典礼的时候,实验室也没咋进过
组会遭遇挫折	就这样度过了大概一个月,轮到我讲论文了,当时看了一篇文献,懂得不多就讲了,然后被轮番攻击,各种刁难
科研学术存在困难	实验室大都是本校保研上来的,从大一就实行导师制,提前接触过这个东西,我底子差,基础薄弱
同伴冲突与社交厌恶	实验室有些人丑恶的嘴脸,我是真的看不下去,现在想一想就头疼
面临现实家庭压力	考虑到父母的年龄大了,工作也做不动了,身为家里的老大,理应替父母分一些担子,所以本学期回去就退学了

2. 聚焦编码

在初始编码基础上,聚焦编码是对更具内容解释力、出现频率更高、与研究问题联系更紧密的编码进行筛选与合并的过程,其核心任务是将零散的初始编码归纳为具有内在逻辑的概念单元,强调概念之间的聚合性与抽象性^[17],能够为后续理论建构提供清晰的结构框架。经过多轮梳理与比对,本研究最终提炼 27 个聚焦编码,并进一步归纳得到 4 个类属,12 个次类属(见表 2)。

表 2 聚焦编码

类属	次级类属	聚焦编码	类属	次级类属	聚焦编码	
教育结构困境	导师影响	C2 导师指导缺失	主体困境	认知困境	C6 自我怀疑	
		C4 导师压榨			C18 无意义感	
		C13 导师指导多变			C23 自我效能感坍塌	
		C16 导师无效反馈			C9 社会评价	
	学术资源	C8 制度缺陷	社会结构困境	社会压力	C10 职业迷茫	
		C20 学术资源匮乏			C11 经济压力	
	劳动异化	C21 劳动边界异化	同侪压力	同侪压力	C12 同侪压力	
		C22 学术劳动异化			C19 家庭压力	
主体困境	学业压力	C1 学术压力	现实冲突	理想幻灭	C15 理想幻灭	
		C5 学术兴趣丧失			决策困境	C24 退学决策认知
		C7 研究方向错位				C25 退学风险感知
	身心困境	C3 情绪崩溃	退学意愿演变	行动矛盾	C26 隐性抵抗	
		C14 身心崩溃			C27 退学行动矛盾	
		C17 心理创伤				

3. 理论编码

理论编码具有整合性,核心在于明确类属之间的逻辑关系,使分析过程更加连贯系统。研究者需依据一定的逻辑建构类属间的联系,推动理论的自然生成^[18]。研究发现,教育结构困境、主体困境与社会结构困境不仅分别构成研究生退学意愿的重要动因,也常以不同形式的叠加、交织与联动,共同推动研究生退学意愿的形成。进一步分析显示,研究生个体在面对结构性或主观性压力时,其退学意愿通常经历现实冲突、决策困境与行动矛盾等发展阶段,有效揭示了研究生退学意愿的生成过程及其阶段特征(如图 1)。

4. 理论饱和度检验

在完成对 190 篇微博长帖的系统编码后,对剩余 22 篇未编码文本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显示,未出现新增概念或新的类属关系,表明模型已饱和、理论体系趋于稳定。

三、研究结果

(一)生成类型:从单一驱动到多重联动的组合效应

研究生退学意愿的生成是多重困境并发的组合效应,具体表现为三大类 7 种类型。

1. 单一困境驱动:教育失能型、心理崩解型和外部挤压型

单一困境驱动是指研究生退学意愿主要由单一类型的困境支配,呈现明确的动因指向,即教育结构困境、主体困境或社会结构困境中的任一类因素,独立促使研究生个体产生退学意愿。该类型的困境表现为某一类压力或张力的凸显,是个体经验与制度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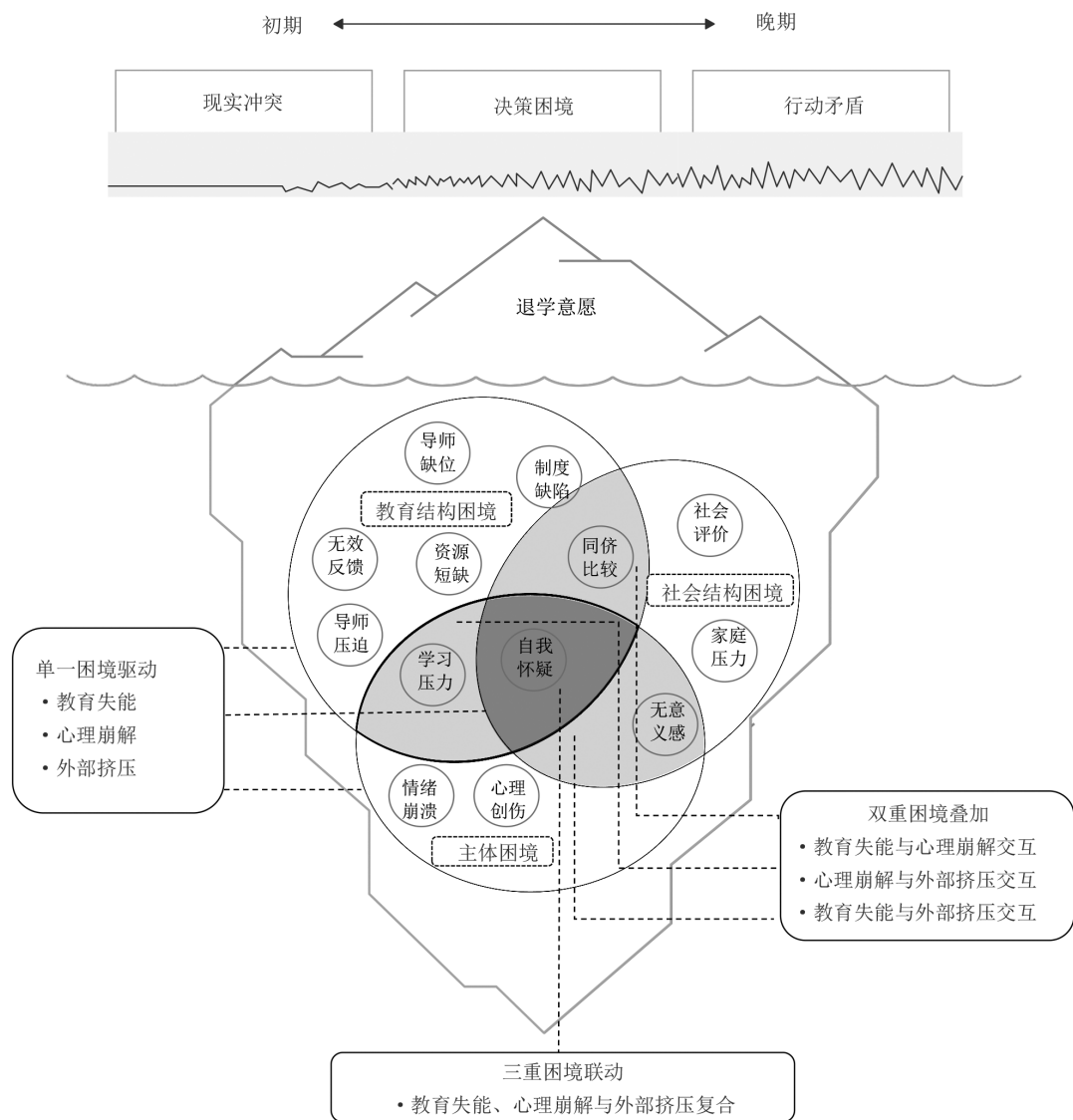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生退学意愿的生成类型与阶段特征模型

一是教育失能型。教育体制内多个关键环节的功能失调构成研究生退学意愿的重要结构性动因。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核心支撑,导师直接影响学生的学术成长与心理承受力^[19]。在理想状态下,导师应在学术指导、科研伦理与情绪支持等方面提供系统性保障,然而在实际情境中往往不尽如人意,导生关系紧张问题日益凸显^[20]。在指导关系紧张的情形下,学生难以获得必要的学术引导与情感支持^[21]。“其实我心态崩了的最主要原因,是我导师一学期见两三次,见面也不管你。给你指导,说几分钟就完事了,买一切科研的东西还要自己出钱。”(A013)当学术不确定性与导师指导缺失并存时,学生往往孤立无援,出现导生疏离与关系冷漠的情况^[22],进而对继续学业产生动摇。

制度层面的压力同样加剧研究生的困顿,即不断提高的毕业要求在制度性约束下加重了学生的学业压力^[23]。“碰上学院的毕业要求又变高了……那段时间经常折磨自己,动不动就流眼泪。”(A013)此外,科研成果的归属权混乱,也反映了课题组内权力配置失衡及潜在利益冲突^[24]。“把我研一一整年工作的重头数据全部分给了研一两为师妹写文章了……还让我教她们处理数据……去找大老板,大老板只说了一句让我名字往前排。”(A083)在课题组层级化的权力结构中,学生的知识劳动缺乏应有保护,其成果容易被“集体安排”和重新分配,且难以获得有效申诉或补偿。这削弱了研

究生个体对同门的信任和对课题组的归属感,同时加剧了研究生的学术边缘化,强化了其退学意愿。

高压性的实验室管理模式进一步暴露了教育制度运行中的结构性张力。“以前觉得工作单休我都接受不了,一天哪够我缓的,现在研究生直接无休。以前觉得学习到十一二点已经是我的极限,现在三四点,通宵也经常。”(A096)在缺乏制度性劳动保障与权益保护的情况下,学术劳动逐渐异化为压迫性的体制劳动,研究生的身心健康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其退学意愿的滋长。

二是心理崩解型。研究生退学意愿的生成通常深植于个体内部长期积累的心理负荷与认知冲突之中,表现为“由内而生、由心而退”。其中,学术方向的错位与兴趣的丧失是主体困境的显性表现。“真心很不喜欢新闻这个专业……更不愿意做新闻史的老师,三年之后几乎谁都不想承认我。”(A021)学生对所学专业缺乏兴趣、对研究方向感到迷失,深陷专业认同危机与学术路径错位的双重夹击。

更深层的困境表现为对学业意义的持续质疑,并逐步演变为深刻的无意义感,呈现系统性自我怀疑与存在性虚无^[25]。“我越发不知道我读研是为了什么……有时候真的觉得我看不清自己,做不了决定,一直在随大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自卑否定自己,怕这个怕那个。”(A021)当学术身份无法与人生意义建立清晰联结时,研究生学习过程便会逐渐沦为机械忍耐与精神消耗。

依据自我决定理论,个体内在动机与心理健康依赖于胜任感、自主性与归属感三大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26]。然而研究数据所呈现的叙事,恰恰揭示了一个系统性抑制上述需求的环境。在学术投稿频繁受挫的情境中,个体自我认知陷入否定性循环。“每次遇到还是很难过……我好垃圾,我好差劲……仿佛20来年的生活什么也没学会……自卑感与日俱增。”(A069)其自我评价系统表现出明显的功能性紊乱,自我效能感系统性崩解。在这种主体困境中,个体不仅承受现实层面的压力,更在内心反复进行自我怀疑与价值重估。在缺乏外界有效支持系统与内部心理调节机制的双重失衡下,读研生活逐渐演变为难以承载的情绪负荷与精神重负。理想自我与现实状态之间的巨大落差使研究生个体容易对学术身份产生疏离,最终形成深刻且持久的退学渴望。

三是外部挤压型。研究生退学意愿也存在由社会结构困境驱动的情境,个体在教育选择、职业规划、同侪比较与家庭影响的结构张力下,逐步形成退学意愿。社会评价与学历焦虑是重要诱因之一,在高校层级高度分化的背景下,教育选择常被预设作为一种策略性跃迁行为,读研被视为成功的象征,形成一种心理上的预设认同^[27]。当原本的冲刺计划因不自信与求稳而让位于更安全的选择时,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对自身处境的持续怀疑与后悔情绪。“本来是想考好一点的学校的,学校老师说有点难度。也是因为对自己没信心……当时想着只要是研究生学历就可以,真没想明白,就随波逐流。”(A017)学历层次未达预期,教育决策过程缺乏主导权,使研究生在早期选择中就埋下退学意愿的伏笔。

家庭的影响同样深刻,家庭成员对研究生教育的象征意义怀有高度期待,但在长期决策过程中存在压制与支持缺失,从而产生负面效应^[24]。“家里人一开始很不理解,辛苦考上的为啥不去上……我高考那年也想复读,家里人怎么也不让。”(A017)这种在重大人生节点上缺乏自主空间的经验累积,构成社会结构困境的深层背景,进一步推动了退学意愿的形成。

与此同时,教育成本与投资回报的现实考量也深刻影响着退学意愿的形成,尤其在家庭资源紧张背景下更显沉重。对于部分学生而言,读研不仅意味着工作时间的延迟,更是对家庭经济的持续消耗。“不想浪费三年时间和父母的钱。”(A017)在无法看到学业与未来发展的明确关联时,研究生教育逐渐成为一种成本高昂却回报不明的无效投资。经济能力不足与家庭负担叠加,使退学成为既是心理解脱又伴随伦理挣扎的选择,情感亏欠与现实无力感相互强化,进一步推动了退意的生成。

2. 双重困境叠加:教育失能与心理崩解交互型、心理崩解与外部挤压交互型、教育失能与外部挤压交互型

研究生退学意愿的生成具有高度复杂性,在实际情境中,研究生不同类型的压力相互交织,形成

更为复杂的退学动因。

一是教育失能与心理崩解交互型。导师制度运行的低效与错配构成教育支持系统的结构性障碍。部分导师对研究方向缺乏持续关注,指导内容随意且缺乏建设性。“做的方向就是导师一时兴起想做的……听不懂的问题就直接忽略,听得懂的就开始瞎指导。”(A171)科研支持的缺失与沟通反馈机制的阻滞,使学生的研究推进充满挫折感与无力感,甚至演化为导生冲突与师生间的结构性暴力^[28]。在长期支持匮乏与高压环境下,个体逐步陷入持续性情绪疲惫与心理困顿。“每天都很焦虑、很惧怕,没有任何精力去做科研。只要没有进度就等于没干活。”(A171)科研自主性被挤压,科研主体性与自我效能感不断被削弱,自我评价系统随之崩解,出现典型的主体性困境。长此以往,教育支持的缺失与心理失衡的叠加,不仅放大了研究生的各种压力,也压缩了个体自我修复与调适的空间,使退学成为情绪释放与现实应对的合理化选择。

二是心理崩解与外部挤压交互型。当研究生身份不再象征希望与跃迁而逐渐转化为心理负担与责任债务的标识时,退学意愿往往会在坚持与难以为继之间持续拉扯。冲突的形成并非单一维度困境能解释,而是在意义危机与结构性压力的交织中不断发酵。从主体层面看,长期的研究受挫与自我否定使研究生面临持续的心理资源枯竭。“是不是我太脆弱,无法承受学业压力。”(A149)研究生反复的自我怀疑,不仅会引发对学术生活控制感的削弱,还会造成个体内在价值感的坍塌。在外部层面,家庭资源的紧张与沉重的回报责任使研究生在心理压力之外还要承担经济与伦理负担。“25岁了,我愧疚的在于自己还是这么无能为力……父亲做过手术,还得坐十几个小时的大巴回家,我的内心充满自责。”(A149)在代际不平等与资源错位的结构中,研究生身份被赋予超越学业本身的社会期待与家庭意义^[29],形成情感与道义的双重压力。此时的退学不是逃避,而是兼顾自我与家庭责任的理性选择。

三是教育失能与外部挤压交互型。当教育过程中的支持断裂与社会资源压力共同作用于研究生个体时,其既难以在学术路径上获得正向支持,也难以在社会资源中寻求有效缓冲,最终在压力累积中萌生退学意愿。指导资源的缺位与评判标准的模糊,严重阻碍了学术发展,学生在导师指导下长期陷入无意义的“修修补补”,缺乏清晰的研究路径与有效支持。“改了一年的小论文,全在改文字内容;问他这样改行不行,他说让我自己去看。”(A122)负向评价和否定式沟通方式进一步打击了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压缩了其在学业过程中自主探索的心理空间。“还扯什么你这样在社会上会不如别人,甚至落后什么的。”(A122)同时,家庭经济压力与未来生计焦虑,也促使研究生担负对家庭经济回馈的沉重期待。“家里真的蛮穷的……想顺利毕业,赚两年钱补贴我妈。”(A122)在缺乏稳定社会资源支持的情境下,研究生教育原本承担的阶层跃升功能被削弱^[30],取而代之的是对基本生存压力的应对与妥协。在教育支持缺失与社会结构压力交织作用下,学生在挣扎与自责中逐渐丧失坚持的初心。

3. 三重困境联动:教育失能、心理崩解与外部剂压复合型

研究生退学意愿还呈现由多重困境相互渗透、动态耦合驱动的复杂生成过程。教育结构困境、主体困境与社会结构困境在特定情境下联动,形成复合压力机制,使个体在学术、心理和社会层面的困境交织中产生难以调和的退学意愿张力。

教育支持体系的失序使个体在学业进程中缺乏平等对待与有效指导。“每天压迫 pua……更可笑的是她不平等的对待……她一想起来个什么事就来个电话。今天早上七点临时通知来人除草。”(A095)不平等对待和高强度干预明显削弱了研究生科研的自主感和掌控感,加剧了学业压力。在社会结构层面,家庭期望与社会评价体系共同塑造了外部规训逻辑,使个体的学业选择被迫纳入道德与成功的叙事框架。“被家里人逼着读了这破研究生,把我置于道德制高点上,不读研怎么能行呢?那未来有出路吗?你多爱学习、多懂事听话啊。”(A095)家庭的高压期待与社会对学历的功利化解读,

使研究生在心理上受到持续压迫。由此,在教育与社会压力的长期作用下,研究生的情绪耗竭和心理崩解状态逐渐显现。“我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像自己了,我甚至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说哭就能哭。”(A095)当研究生向同辈或亲友表达困境时,也常遭遇情感上的忽视。“我跟别人说累啊、感觉自己毕不了业、不想读了的时候,大家只会说怎么会不让你毕业,你多认真,不能不读,读完就好了……大家的想法跟我都不一样,聊下去只会更痛苦。”(A095)心理困境不仅源于学术过程本身,也因缺乏情感支持与社会理解而被持续放大。教育结构、社会结构与主体困境的联动,不仅阻碍学术进展,更导致心理崩溃,当个体难以在现实中获得有效支持与出路时,退学成为研究生应对持续压力的必然选择。

(二)阶段特征:从现实冲突到行动矛盾的反复拉扯

研究生退学意愿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呈现较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通常会经历以下3个阶段的反复拉扯。

1. 现实冲突:理想幻灭的触发期

研究生退学意愿在初期阶段通常表现为对理想与现实之间落差的敏锐感知,这是退学意愿萌发的重要触发因素。进入研究生阶段时,个体往往怀有较高期待,希望通过学术训练获得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但随着学业推进,学术困难、导师指导缺失及社会期望的未能满足,使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日益显现,从而引发失望与挫败感。“明明我对生活充满斗志,读研却将我逼入一个框架……我开始质疑,是否值得为理想牺牲自己的身体和心情?”(A006)“满怀着希望和梦想的我哪里去了呢?早就不知所踪了……老师纯散养,研一上学期都在做原料,研一下学期接的课题,师姐不教什么都做不出,老师也不管不顾,浑浑噩噩又浑身疲惫地过完了一年。”(A172)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研究生感到迷茫,并萌生了退学的想法。

2. 决策困境:反复拉扯的胶着期

在退学意愿初步形成后,研究生进入决策困境阶段。在这一阶段,退学不再只是情感上的冲动选择,而成为涉及风险与不确定性的理性权衡。“最近在纠结是否退学,我发现整个课题组的运作模式我无法苟同,利己主义与恶性竞争让我感到身心疲惫。我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进步,日复一日陷入焦虑之中。”(A087)研究生在此阶段评估退学后的社会与经济后果,不仅需要面对学术失败对自我认同的冲击,还需权衡继续学业与退出学业的利弊,尤其是对未来职业与生活的影响。“如果创业失败,我的选择就会非常有限。”(A011)对退学风险的持续感知,使研究生在理性评估与情绪困扰之间反复摇摆,从而陷入内心的两难境地。

3. 行动矛盾:隐形抵抗的存续期

随着退学意愿进一步增强,研究生进入行动矛盾阶段。在这一阶段,尽管内心渴望放弃,但长期积累的心理负担与外部环境压力使其难以付诸实际行动,研究生的犹豫不决在实践中表征为“隐性抵抗”,在去留之间反复挣扎,却难以迈出实质性一步。“研一时,我已经想退学了,甚至哭过、抑郁过,但我不敢告诉导师。”(A033)这种行动滞后现象凸显了心理枷锁与结构性压力对个体行为选择的深层束缚。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研究生最终还是走向了退学。“最后我还是退学了……浪费了学校的研究生名额,浪费了导师的研究生名额,我也知道我对不起他们,也对不起我的父母,但是我不想因为要考虑这些而选择继续忍下去。”(A018)长期的心理煎熬使退学成为一种情感与理性并存的抉择,这既是对学术困境的终结,也减轻了研究生个体内在的心理负担。相较于最终退学的个体,更多持有强烈退学意愿的研究生则长期处于“隐性抵抗”状态。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系统揭示了研究生退学意愿并非孤立的个体决策,而是在多重结构性压力下组合生成的

复杂过程,构建了研究生退学意愿的解释框架。一方面,研究生退学意愿的生成并非线性叠加,而是系统性的组合效应,即教育结构、主体心理与社会结构三大困境的交织与联动。具体呈现为三大类7种类型:单一困境驱动下的教育失能型、心理崩解型与外部挤压型,双重困境叠加下的教育失能与心理崩解交互型、心理崩解与外部挤压交互型以及教育失能与外部挤压交互型,三重困境联动下的教育失能、心理崩解与外部挤压复合型。理解研究生退学意愿的生成需要更加关注困境组合模式,这不仅解释了为何处境相似的学生意愿迥异,也指明政策干预需从单要素完善向系统性支持转变。另一方面,研究生退学意愿呈现从“现实冲突”到“决策困境”再到“行动矛盾”的阶段特征,现实冲突触发意愿,决策困境体现理性计算与情感拉扯的胶着,行动矛盾通过隐性抵抗维持平衡。这一研究发现打开了研究生内心决策的“黑箱”,将退学意愿从静态结果还原为一个充满矛盾、反复和主体能动性的动态过程,为理解研究生心理健康与学术投入提供了过程性视角。网络空间中“我不想读了”的集体叹息,既是寻求情感共鸣的个人呐喊,也是对教育体制与社会文化叙事的无声抵抗,折射出制度刚性与个体发展柔性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本研究回应了学生整合模型与学生流失模型的经典论断。学生整合模型强调“前置条件—学术与社会整合—目标与院校承诺”的互动机制^[31];学生流失模型突出环境变量与态度因素在学生流失中的作用,强调学生背景特征、组织决定、满意度和机构承诺等因素对学生流失的影响^[32]。本研究揭示的导师指导缺位等教育结构性困境触发退学意愿,印证了学生整合模型中学术整合失败导致退学的核心观点;社会压力、家庭压力等社会结构困境也显著影响决策,与学生流失模型强调的外部环境变量作用相符。无论培养阶段与时代背景如何变化,学术支持系统的健全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压力始终是理解学生留存的关键变量。更重要的是,本研究构建的解释框架揭示了经典模型解释当代研究生学业困境的局限性,并从形成机制、阶段过程与表达场域3个维度进一步对经典理论进行了拓展。在形成机制上,研究发现,研究生退学意愿的产生遵循组合效应而非线性效应。相同的退学意愿水平可能源于完全不同的困境组合,不存在唯一的致因路径;单一负面因素的影响会因其所处的困境组合不同而发生根本性改变,这解释了学生处境相似却意愿强度差异的现象。因此,本研究超越了因素分析的传统问题,回答了关键因素是如何组合并发挥作用的构型问题,这为理解个体差异与决策复杂性提供了更为精细的解释框架。在阶段过程上,本研究为经典宏观阶段论补充了微观心理的细化描绘,详细阐明了研究生退学意愿从萌生、发展、固化到以特定形态存续的完整链条,并将其还原为一个充满理性博弈与情感挣扎的心理建构过程——现实冲突阶段体现为期望破灭与认知失调;决策困境阶段表现为理性计算与情感挣扎的反复拉扯,解释了退学意愿长期存续且波动的原因;行动矛盾阶段则体现意愿在无法付诸行动时,只能借由隐性抵抗来维持心理平衡。这一阶段性描绘揭示了“想退而未退”现象背后的复杂心理过程,将经典理论中承诺度下降的静态结果还原为可辨析的心理阶段与矛盾状态。在表达场域上,将经典理论从物理校园拓展至数字空间的集体话语建构。研究发现,微博等数字平台已成为研究生表达退学意愿、寻求共鸣、建构集体认同的新场域,“我不想读了”从私人情绪演变为公共话语,并反过来影响个体决策,为经典理论嵌入了数字社会化维度,有助于揭示研究生退学意愿在当代的表达形式与社会动员机制的变革。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回应经典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揭示研究生退学意愿的形成机制、聚焦阶段性特征并引入数字表达场域,为理解新时期中国研究生退学意愿困境提供了更具解释力与时代适应性的解释框架。同时提示研究者,理解研究生退学意愿不能止于个体归因,应回到制度与心理交汇的现场,从微弱声音识别结构张力,从沉默经验重塑教育的公共回应力。

(二)对策与建议

研究生退学意愿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而是一种在沉默中发酵的状态,伴随情绪波动、意义感丧

失与结构性压力的交织,其存在意味着行为尚未彻底发生,仍有干预与转圜的空间。

1. 优化教育制度结构,预防研究生退学意愿早期滋生

推动研究生教育制度柔性化转型,是纾解结构性困境并预防研究生退学意愿早期滋生的关键。在当前高度标准化与绩效导向的管理模式下^[33],忽视学科内在差异与学生个体发展的多样性,极易在学术评价与日常管理中制造制度性压迫感,导致“导师指导缺失”“学术劳动异化”等教育失能问题,这也正是现实冲突阶段理想幻灭的重要诱因。为此,需要构建多轨制发展性评价体系。根据学科核心属性、学生所处发展阶段及背景设定差异化目标,从源头缓解因理想与现实落差所引发的早期张力。针对教育结构困境,应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研究生培养单位、导师群体以及学生等协同探索制度优化路径:完善导学关系治理机制,建立动态评估与反馈机制;强化导师责任与伦理规范,明确指导时长与方法,保障学生学术劳动和休息权益,并设立匿名反馈及独立审计机制;营造尊重多元选择的文化氛围,正视退学或学业调整合理性,建立去污名化的调整机制。例如,可以通过设置学术间隔年^[34],允许面临严重心理耗竭或研究困境的研究生申请为期一学期或一年的休整期,在此期间暂停科研,接受心理咨询、职业规划或参与校外实习、志愿服务等;提供跨学院、跨系所的导师更换和微专业调整通道,通过标准化程序和学业指导委员会支持学生重新评估学业与自我的关系,避免过早陷入复杂决策困境。

2. 构建全程支持网络,纾解研究生退学意愿的阶段演进

构建贯穿退学意愿全程的多维支持网络,是缓解主体困境、应对心理崩解的核心策略。研究生阶段面临学业压力、意义迷失与未来不确定性,缺乏有效支持易导致自我效能感坍塌、情绪衰竭和存在性绝望,加剧决策焦虑与行动阻滞。高校应整合学术指导、心理疏导与生涯规划资源,形成全过程支持体系,实现研究生退学困境纾解的阶段精准适配。在现实冲突阶段,应由专业教师、辅导员、心理咨询师与导师联合开展预防性干预。建构意义锚点,在入学教育中纳入学术心理健康与压力调适模块,强化新生学术身份认同引导与期望管理,设立“学术导师”“心理导师”协同机制;借助数字化工具识别高风险群体,开展认知重评与意义聚焦辅导,阻断“无意义感”蔓延。在决策困境阶段,提供整合支持与决策导航。成立由资深导师、职业规划师、心理咨询师组成的学术发展会诊小组,为学生提供一对一评估与路径规划;开发可视化退留决策工具,量化呈现不同路径的后果与资源需求,包括退学决策平衡单、后果评估清单等,降低个体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感知。在行动矛盾阶段,破除沉默壁垒,为长期隐性抵抗的学生开通低门槛匿名倾诉与资源精准匹配通道,同时提供低压学业延续选项;建立人性化离校机制,为最终选择退学的学生提供非惩罚性流程与后续支持。

3. 消解污名文化叙事,拓展研究生退学意愿容错空间

发起重塑包容性教育价值观的社会协同行动,是消解社会结构困境赋予研究生退学意愿道德枷锁并创造社会容错空间的长远之策。社会评价压力、家庭高度期待与经济焦虑是研究生退学意愿的重要社会根源,并使研究生在决策阶段加剧失败恐惧,在行动阶段强化污名顾虑。为此,需要通过重构社会成功叙事体系,消解污名文化叙事,拓展研究生退学意愿容错空间。实践中,高校可联合主流媒体与公共平台发起倡导行动,分享多元化转型案例与实证数据,解构“退学即失败”的霸权话语,传递“基于个体福祉的理性选择同样是成功”的正确价值观,降低个体社会风险感知。将家庭转化为关键支持力量,通过科学设计干预措施缓解家庭压力源,开发家长信函、认知干预工具包、家长课堂等形式,传递研究生教育的真实压力与多元发展路径,使其成为研究生学业困境的情感支持者而非阻力者。营造校园包容文化氛围,在微观环境中推广学业困境讨论与多元选择尊重,通过举办讲座、沙龙等活动,将暂别学术或职业转轨视为负责任、受尊重的探索,建立学生互助网络,减少心理隔阂。系统性削弱污名烙印,只有从文化土壤中削弱退学的污名,才能为正在挣扎的个体尤其是困于行动矛盾阶

段的大多数有意愿退学的研究生松绑沉重的社会枷锁,释放其基于生存理性与个人福祉主动抉择的勇气。只有让高校、家庭与社会媒体形成持续合力,通过多层次协同干预,才能为研究生群体创造更加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初步构建了研究生退学意愿的生成类型与阶段特征模型,但仍存在局限。首先,数据来源于微博超话自发叙事,一方面缺乏同一群体的历时性追踪,难以捕捉意愿的波动与关键转折;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文本的匿名性表达,限制了对学科、年级及硕博层级等群体差异的系统分析。其次,在研究视角方面,研究仅聚焦研究生群体,可能存在主观认知偏差。未来研究可结合长期追踪或回溯访谈,深化对动态机制的理解,并拓展多主体视角,包括导师、管理者及家长视角,以增强科学性和解释力。

参考文献:

- [1] 张国栋,曾剑雄.博士生学业完成情况受何因素影响最大——基于某“双一流”建设高校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23,44(4):5363.
- [2] Valencia Quecano L I, Guzman Rincon A, Barragan Moreno S. Dropout in postgraduate programs: a under explored phenomena—a scoping review[J]. Cogent Education,2024,11(1):420.
- [3] Lovitts B E. Leaving the ivory towe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departure from doctoral study[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2:82165.
- [4] Wollast R, Boudrenghien G, Van Der Linden N, et al. Who are the doctoral students who drop out?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rate of doctoral degree completion in universit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2018,7(4):143-156.
- [5] Castelló M, Pardo M, Sala-bubare A, et al. Why do students consider dropping out of doctoral degrees? institutional and personal factors[J]. Higher Education,2017,74(6):1053-1068.
- [6] Maher M A, Wofford A M, Roksa J, et al. Exploring early exits: doctoral attrition in the biomedical sciences[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Retention: Research, Theory & Practice,2020,22(2):205226.
- [7] 德安,正平.从58名研究生要求退学谈起[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88(4):4648.
- [8] 杨东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大之中的阶层差距[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1):1925.
- [9] 陈予,相羽,张学良,等.硕士研究生挫折应对能力研究及对策分析——以天津市高校为例[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5,(11):6066.
- [10] 何妃霞,周小李,娄真真.硕士生退学意向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分析[J].研究生教育研究,2023(1):2934,53.
- [11] 周静,周正.研究生缘何想退学?——基于扎根理论的硕士研究生退学意向研究[J].研究生教育研究,2024(2):29-36,67.
- [12] 王和平,耿宗程.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视域下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的规范理路[J].高教探索,2024(2):7280.
- [13] 郭勇,高歌,王天勇,等.社交网络舆情意见领袖研究:蝴蝶图示、甄别及影响力评价[J].图书情报工作,2019,63(14):6273.
- [14] 张洁凡.在线学习社区的集体话语与披露空间[J].中国青年研究,2022(1):114-119.
- [15] 冯海龙,冯世同,何乐,等.贴合中国式战略学理论涌现的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研究[J].管理学报,2024,21(12):1763-1773.
- [16] Charmaz K. 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 a practical guide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M]. London:Sage,2006:4856.
- [17] 冯海龙,刘鸿进,刘俊英.情境时间、时间组织价值链与时基战略变革——基于医疗卫生产业组织样本的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23,26(6):7083.
- [18] 陈丽君,金铭.人才政策营销的要素内涵与作用机制——基于扎根理论方法的探索性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16):135-141.
- [19] 潘炳如,顾建民.导师指导因素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不同学科类别的差异性分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2(4):5260.
- [20] 曾剑雄,张国栋.从责权利的视角探究导师矛盾——基于博士生访谈材料的质性分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2(9):5462.
- [21] 曾剑雄,张国栋,王国耀.博士生导师“为导不导”行为的表现类型及生成原因——基于博士生访谈的质性分析

- [J]. 研究生教育研究,2023(6):6370.
- [22] 刘志. 研究生导师和学生关系问题何在——基于深度访谈的分析[J]. 教育研究,2020,41(9):104116.
- [23] 张海生,李立国. 教育学博士生学术规训中的导生互动:体验图景、关系类型及其实践转化[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5(4):6477.
- [24] 曾剑雄,张国栋. 研究生与导师冲突的类型特征及其化解——基于20个案例的分析[J]. 复旦教育论坛,2023,21(1):3643.
- [25] 王东美. 意义感光谱与青年自我意义生成[J]. 探索与争鸣,2023(6):2022.
- [26] Declé L, Ryan R M.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human behavior[M].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5:1440.
- [27] 宫颢韵,田浩然. 走入考研循环:从有限理性视角看大学生考研决策行为[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3(7):5461.
- [28] 林杰. 沉默的螺旋:导生欺凌的辨析与防范[J]. 江苏高教,2025(1):1423.
- [29] 李沁柯,夏柱智. 破碎的自我:“小镇做题家”的身份建构困境[J]. 中国青年研究,2021(7):8488,95.
- [30] 郭琳琳,王阳. 当代青年大学生的身份生产与阶层流动——基于“孔乙己文学”现象的虚拟民族志研究[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25,46(1):164172.
- [31] Tinto V. Dropout from higher education: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of recent research[J].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75,45(1):89125.
- [32] Aljohani O.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major studies and theoretical models of student reten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J].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2016,6(2):418.
- [33] 王梅,时玉坤. 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德国大学终身教职绩效评价体系研究[J].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科学,2025(4):147165.
- [34] Feitosa C D A, Fernandes M A. Leave of absence due to depression[J].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Enfermagem, 2020,28:e3274.

(责任编辑:张海生 杨慷慨 校对:杨慷慨)

Why I No Longer Wish to Continue: The Formation Patterns and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Graduate Students' Dropout Intentions

Wang Mei, Meng Junhui, Shi Yukun

(School of Education,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4, China)

Abstract: Graduate students' dropout intentions, a previously concealed issue, have increasingly emerged in public discourse through digital spaces. Based on 212 long-form posts from the “Graduate Student Dropout” super-topic on Weibo, a 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was applied to examine the types and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graduate students' dropout intention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dropout intentions is not a linear cause-and-effect process, but rather the combined effect of multiple concurrent dilemmas, manifested in three categories and seven types: under single-dilemma conditions, the education failure type, psychological collapse type, and external pressure type; under dual-dilemma overlap, the education failure-psychological collapse interaction type, psychological collapse-external pressure interaction type, and education failure-external pressure interaction type; and under the tri-dilemma linkage, the composite type combining education failure, psychological collapse, and external pressure. The emergence of dropout intentions is gradual rather than instantaneous, typically unfolding through three stages characterized by repeated tension: reality conflict, decision dilemma, and action contradiction. 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the “critical state” of these intentions requires coordinated action across structural, supportive,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including optimizing educational systems to prevent early emergence, building comprehensive support networks to alleviate stage-specific pressures, and dispelling stigmatizing narratives to expand tolerance, thereby promoting the healthy functioning of the graduate education system.

Key words: graduate student; dropout intention; 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 critical state